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杨镰◎主编

我的探险生涯

◎【瑞典】斯文·赫定 / 著

◎ 孙仲宽 / 译 杨镰 / 整理

ISBN 978-7-228-13242-3



9 787228 132423 >

定价:54.00 元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宿 白 马大正

主 任 李维青

副 主 任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张 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石晓奇 李春华 杨 镰 余太山

张瑞田 阿拉腾奥其尔 陈重秋

罗 沛 董炳月

主 编 杨 镰

执行编委 李春华

执行编辑 罗 沛

出版说明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文献中有了关于西域的正式记载,而历代对于西域的界定,又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域的主体部分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范围。因此,人们往往会把西域——新疆作为同一概念联系起来使用。

西域这一片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袤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地理位置独特。几千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行者一起开拓经营,创造了辉煌一时的历史。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贯穿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会,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荟萃的特点。然而,自14世纪以后,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改变、海运的畅通,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片曾是东西交通枢纽、人类几大文明的交会之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二版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为千年流沙湮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汉书》的楼兰故城。沙埋故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闾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更名为鄯善）的边境重镇。王国维《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故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培”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鄯善）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佉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佉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想象之词。楼兰故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佉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意是“城镇”。“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佉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故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现代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故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

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寻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赫定终于见到了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入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入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中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

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不但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十余种探险纪实之作,在读书界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新一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我希望新的大系有机会补救第一版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出于技术与成本问题,曾删去了书中的绝大部分插图,而这些插图与文字一样,都是忠实的历史记录。再者,为重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一些书比如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不能忽略。另外,确定入选书目时,一定要可读性、纪实性并重,等等。

相信具有了上述特点的新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能成为认识新疆的长线读物,拥有不同年龄段的读者。



● 马大正^①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正如中国边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样,中国边疆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以西北史地为例,清人的西域史地学派实际是当时学界的风向标,一论既出,马上为世人瞩目。

19世纪以来,中国为列强环伺,面临瓜剖豆分的危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掀起了边疆研究热潮,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以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为代表,学人普遍将关注边疆视为国体存没的特征。20世纪前期,在民族危亡的激发下,边政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以前的边疆史地研

^①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毕竟是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人物,1924年的夏天,赫定从环球旅行中归来,在美国时,出版商向他约稿,希望他写一部通俗的自传。这种稿约以前也多次遇到过,但他从未把它列入议事日程。也许是恰逢他正在反思一生之时,也许是他需要靠回顾来鼓起自己面对低谷的勇气,也许是他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便重新踏上征途,不管到底为了什么,这次他又在书斋里坐了下来,为自己写一部生平回忆——自传。这部名为《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为《亚洲腹地旅行记》)的书很快就面世了,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先是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立即就出了瑞典文版、德文版……几年间,竟风行草偃,一气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成为赫定著作当中最脍炙人口,译文文种最多的一部。

随着《我的探险生涯》的问世并获得普遍好评,赫定也重整旗鼓,又一次回到了久违的亚洲大地。1926年,赫定下榻于北平(即今北京)的六国饭店(即今北京饭店贵宾楼)。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准备,1927年5月9日,赫定从北平的西车站乘火车出发了。这次他和中国学者徐炳昶教授共同率领一支多学科的现代化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走向西北的大漠和草原。斯文·赫定当然不是第一个西域探险家,但他是近代把西域探险引入国际社会的第一人,是首开西域探险的“古典时代”的先行者。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历史的转型期,率先使本是“单枪匹马”的古典探险活动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范畴。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陆续进行了八年(为论述方便,我一般把此后由赫定主持的1933~1935年的中国西北公路勘测活动也归入其中)。而在1927~1935年这八年间,斯文·赫定始终是这一大规模的现代科学考察的领导和灵魂。

的活动已趋于停顿,所以流传不广,不大为人所知。可以说,《我的探险生涯》是在中国发行量较高、影响较大的译著之一。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尽管已有了两个译本,但仍有重版,甚至重译《我的探险生涯》的必要。那是因为,今天它仍有众多读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年读者。

在重新组织力量出版新译本尚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为满足读者所需,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先将旧译整理出版。这一想法得到了斯文·赫定著作权所有者——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的理解和支持,并提供了该书的版权,并希望我来做一点校订、整理的工作,以利于青年读者阅读。作为过渡,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案。

三

由于李述礼的译本已重印过多次,所以我们这次的整理以孙仲宽的译本为底本。李述礼虽未说明所据的原文为何种版本,但从他的“译后记”可知,那是一种德文本。孙仲宽同样未说明所据,但据我推测,底本应是一种英文本。就中国翻译界的具体情况而言,英译的总体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著名科学家丁道衡^①校订的,而且出版在李译本问世之后。从文字本身看,孙译或更通顺一些。

我们知道,人名、地名的差异,是今天的读者阅读、利用30年代译著的一个关卡。就《我的探险生涯》来说,这一点更为明显。所以我们所做的整理,主要是就人名、地名略作统一

^① 应该附带提及的是,包头钢铁公司白云鄂博铁矿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丁道衡在1927年7月5日发现的。

工作。除一些重要的地名，如“斯突柯木”（今称斯德哥尔摩），“施嘎资”（今称日喀则）等等，一律改成今天通用的译名之外，一些地方虽小，但在西域探险史上较重要的地名，如“亚南巴鲁科尔”（今称安南坝），也按今天的地图地名资料，重做调整。人名如“贴木耳”，“铁木尔”；“成吉思汗”等，如不做一点归纳，也势必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就孙译本而言，译名本身的不规范（同名数译），是另一个问题。比方第比利斯，书中曾译作“地勿列斯”、“提勿利司”、“提弗利司”，一页当中就将同一地方译成几个不同的名称，不做统一的工作，仍于读者不便，就尽量做了归并。上述情况，一律加注了孙译的原文，以便读者查阅。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对人名、地名的校订工作只能择要进行，有许多具体的地名本无定译，自然也就谈不上统一或归纳；也有属于古今、中外称谓本不一致的。这些都不在整理的范围。当然也不排除有应该改正的，由于我们的水平，却未能注意到。

对一些专有名词，也略做了校订，如高山动物盘羊（马可·波罗羊）两种中文译本都译错了，便径予改正，并加注做了说明。又如把原译文的“犛牛”，一律改为“牦牛”，将后半部的“卢布”全改作“卢比”等。这里应该提醒读者的是，书中的“杨树”、“柳树”，大多数是指胡杨（或灰杨）和红柳（即怪柳），由于一时不易判断出、并找到译者所据的原版本，而且工作量过大，称为杨树或柳树也非大错，就没有一一甄别。

此外，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和误译的地方，也略做了一点校订。这种情况，大多在译注中做了说明。我们总的原则，是在忠于原作的前提下，尽量便利今天的广大读者。

在整理过程中，曾参考过李述礼的译本，但两种译本所



自序



前些日子，刘复教授^①告诉我，《我的探险生涯》这本书已经译成中文，再有一个月即可出版，我实在觉得非常欣慰。因为我希望这本书的内容可使中国学子——对于他们本国内部的探险同科学考察工作有兴趣的——有少许的益处。

如书中所述，从1885年开始，我就在这块大陆的各地漫游。自从我第一次旅行出发至今几乎经过半个世纪，当时我只有二十岁，现在已是六十八岁了。而我对于亚洲戈壁及山岭的留恋绝未减低。正相反，我觉得对于它们的留恋仍如四十八年前一样，那时我把我早年旅行的岁月都消耗在亚洲西部各国。

1890年，我最初走进中国国境，从此在中国停留下来，很少有例外的时候。

^① 刘复(1891~1934)，字半农。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二三十年代任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负责人。

- 187 第二十六章 返回一千二百里
- 195 第二十七章 一段侦探小说
- 202 第二十八章 我第一次到西藏
- 210 第二十九章 野驴与野牦牛
- 219 第三十章 强盗的区域
- 226 第三十一章 到北京去
- 235 第三十二章 回到沙漠中
- 244 第三十三章 亚洲内地最大的河
- 255 第三十四章 和冰块奋斗
- 262 第三十五章 在大沙漠中危险的旅行
- 271 第三十六章 罗布里的故城
- 282 第三十七章 塔里木河支流上的最后几个星期
- 289 第三十八章 西藏东部的探险
- 299 第三十九章 死里逃生
- 308 第四十章 戈壁沙漠
- 315 第四十一章 沙漠中的楼兰城
- 322 第四十二章 回到西藏高原
- 333 第四十三章 假装一个香客到拉萨去
- 343 第四十四章 西藏人的一个囚犯
- 351 第四十五章 被军队挡住
- 359 第四十六章 西藏—印度—西藏

好。但是我没有晚礼服，只得勉强应付过了这次晚餐。

第二天清晨，两个马夫牵着两匹马在客店前面等候着。我们的行李搁在马鞍后面的软包中。我们上了马，马夫在后面跟着走，一半带跑着。我们进了一个深密的丛林，遇见许多步行的和骑马的旅客和大队的驴驮子，驮着运往俄国去的货物，其中有用皮箱装的果干。驴子的铃声在林中引起回音；每一队居首的驴子，颈上所挂的铜铃声音格外沉重。

到了科顿(Kodom)，我们在一个客店里住了一夜，那里有很多的燕子在生满青苔的屋顶上作巢。它们常常飞进飞出，并且从开着的窗洞中穿来穿去。



在风雪中穿越厄耳布尔士山脉

再向前行，道路向山脉斜倾。我们沿塞斐特河(Sefeed - rud) 或白河(White River) 的岸边前进，夜间住在风景美丽的乡村里，四围满是橄榄树、果树、杨树和柳树。我们未曾带着食物，只可买些乡间出产的东西——如鸡、鸭、鸡蛋、牛乳、面包和水果充饥。它们的便宜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以后行进的道路渐渐峭险。我们在厄耳布尔士(Elbure) 山脉中向上行去，树林渐渐稀疏，直到了尽头。



在马斯拉村临时露营

在门迪吉尔(Mendjil)，我们走过一个年代很





在死骆驼尸体边的鬣狗

究在马鞍上睡了很久。有一次，我的马看见一峰死的骆驼，惊跳起来，我便不知不觉地被它摔在地上。那马在黑暗中奔走，后来两个阿拉伯人将它捉住，那时我已经完全醒了。

6月9日晚上，我们队中一个老阿拉伯人（他骑了一匹纯粹的阿拉伯马）赶上了我们。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不再同旅行队一起走了。我觉得在夜间（路上的风景完全在黑暗中）去走180里路程到岐曼沙罕，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不敢自己做主，所以我同那个加尔底亚商人和那个新的阿拉伯人小心商议。加尔底亚商人竭力劝我不要独行，说我们或许要遇见强盗，被他们杀死。但那个阿拉伯人并不害怕，不过除了旅费以外，还要我给他25个克朗一天，他才允诺同我一道去。那样，我不必用九夜，只要四日便能到岐曼沙罕。等我口袋里的钱完全用完了，我将如何，尚不得而知呢。毕竟我



哈密德二世

长被皇帝召进宫去，等他进去以后，听见第一重门砰然关了，但第二重门却没有开。他便知道他的末日到了，因为犯罪的省长都是在那里正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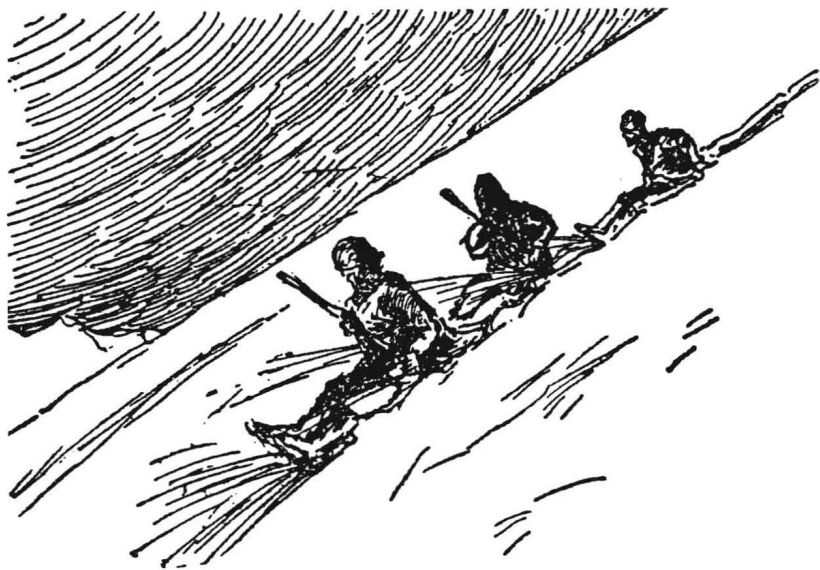
第三重大门，“福门”(Gate of Felicity)以内，是一个库房，那里除别的珍宝以外，有土耳其皇栖林一世(Sultan Selim I)从波斯王伊斯迈尔(Shah Ismail)那里得来的金制宝座、珠子、红宝石和翡翠。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外套、手杖、军刀和弓都藏在宫中一间幽闭的房内，生人一概不许进去，连波斯王自己也每年只到那神圣地点去一次。

在封斋的月里，土耳其王请我们在益尔第兹基阿斯克(Yildiz Kiosk)吃晚饭。鄂斯曼·加西·帕沙(Osman Ghasi Pasha)代做主人，他曾在1877年保卫普利佛那城(Plevna)，抵抗过俄国精兵四个多月的工夫，因此就出了名。餐室狭小，颜色灰暗，但里面点了不少灯烛。外面天色渐渐昏黑。当时因为等着放日落炮，我们都默默地向着金质盘子坐着，好似偶像一般，最后日落的炮声已响，仆人们便将夜饭摆起来。

后来，土耳其苏丹阿卜都·哈密德二世(Abdul Hamid II)出来接待我们。他的身体矮小，目光敏锐，面貌美而苍白；长着胡须和钩形的鼻子；戴了一顶红帽子，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军装。他左手靠在军刀的柄上，很和蔼地接受我们国王委托我们带来给他的亲笔信。

我们又去游览“死人城”(City of the Dead)，斯坦波尔和斯库台里(Scutari)外面的坟地里充满了沉静和平的气象，地上种了许多深绿色的高青扁柏，还有无数的石碑立在那教徒墓上。平的碑上常有碗形的窝，里面积着雨水，小鸟常到这里来喝。它们来时所唱的歌曲或许可以安慰死者的灵魂。





从德马温得山峰滑雪而下

我们走完了石道，便到了雪地。过了一会儿，我便躺在雪地上。我将坚持走到那山顶吗？到了，有什么好处呢？转去岂不是很好吗？不，决不！因为我不能去波斯王面前承认我已经失败。过了一会儿，我便昏睡在地上，但阿利推着我又说：“我们走吧。”我又起来，向前走了不少时候，有时我觉得那山顶是无穷的远，有时它藏在云里，或被雪片隐藏着。最后阿利解下他的带子，将一头牢牢地绑在他自己身上，一头绑在克伯雷·塔季的身上，我拉住了带子中间。这样走起来比较容易些，他们便如此拉我过雪地。

天空清亮起来，山尖好像近些。我们费了12个小时，在四点半到了山顶。在那里要煮开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温度下降到29度，风势很大，天气彻骨地冷。我画了一张草图，拾了几块硫磺标本。我从云缝里望见里海和南边德黑兰四围平原的景致，非常优美。

